

我们的知识和精神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华教师一代一代传授的人格品质，让我们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做出正确的抉择，一辈子受用。对于我的母校清华，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有一辈子的感激和骄傲。

我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你

们还好么？期待着二十年后的重逢！据我所知，老炜还是做事很认真，老超还是那么意气风发，老盖还是那么帅，邹茜业务还是很突出，”张教授”真的成了张教授，老朱还是那么会讲故事，不过他把故事讲到了华尔街，演绎着中国电视传媒界的传奇……

老唐在哪里？老沈的儿子也像他一样力大无比么？小傅在干什么呢？樊老师，小龙，小跬，老妮，程华，高帆，康康，老杨，八路，大炳，老范，美清，老齐，杨勋，老杨，老杜，老猫，老廖，青阳，宋军，清波，世民，还有安维静，威丽，李蔚……你们都还好么？我想你们！📞

课堂之外的学习

和文凯（光7）



和文凯，云南人，清华大学精仪系工程学学士（1992），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2007），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博士后（2008）。现在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时间是公平的，它会把每个人、每件事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一般来说，只有本科在清华念的才算清华人。这并不是那种所谓的清华优越感，而是因为17岁到22岁这段时

间，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实在是太特殊了。而那些跟你一起度过这段岁月的人，在你的心灵世界里自然是旁人无法替代的。

清华五年，本科生碰到那些所谓名师的机会并不多。清华的功课很重，但很多课其实无聊而空洞，特别是高年级的专业课。但少数基础课却让人受益终身。这倒不是因为它们的内容，而是因为过了这些课之后，再遇到任何困难，起码精神上不容易被吓倒。当然，这样的经验并不是只有读清华的学生才会有。大多数的清华学生，在校期间都会遇到一些鬼门关课程，对我来说这就是在清华学堂上的工程制图。我过去很少去清华学堂上晚自习。一方面是因为座位太少，稍微晚点去就没了。更要命的是，清华学堂是木制地板，人走过去，地板叮咚作响，让人很难专心。我在清华学堂上过工程制图课，大学期间所有的悲惨记忆都留在那里。有次制图课期末考试前我做了一个梦：用橡皮擦一条多余的线，结果却把其它线擦掉，更悲剧的是我不知道如何补上它们，当时急出一身冷汗，然后才发现是恶梦一场。人人生而平等，但很多人生

而不能学工程制图。

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我从清华学到最重要的功课，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是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这句话刻在王国维纪念碑上，在清华学堂对面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坡上立着。国内大学的现实，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但清华的学生，或多或少总能受到老清华精神的某种感召。我至今还记得读梁实秋《雅舍怀旧》的激动，虽然他的文字平和而优雅。1949年前清华大学的实际状况，跟书上写的清华精神肯定有一定的距离。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一个正在探求人生的青年人来说，其鼓舞是巨大的，特别当现实是那么灰暗的时候。在我开始疯狂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身边有很多同样在摸索的同学。一个个的小圈子就这么形成，在啤酒和香烟中，这些不同圈子碰撞、交融、分裂，曾经的同道后来也会变得陌生，但这个时期的挚友是终身难忘的。

我在清华跟同学和朋友学到的东西，远远胜过在课堂上学到的任何知识。📞

发七二之浮生如梦

张屹磊（发72）



张屹磊，贵州兴义人，清华大学电机系工学学士（1992），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1999）。曾任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研究部经理，速八（中国）副总裁。现任京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人、执行总裁。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空翱翔

很久很久以前——二十五年应该

可以算很久了吧，我坐了一天的汽车到省城，再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过长江，渡黄河，北京站前换大巴，向东，向北，再向西，经过东门外高高的白杨林，气势恢宏的主楼，最后是礼堂前的大草坪。传说中的清华到了。

那真是些令人兴奋的日子。荒岛甲所工字厅，长城故宫颐和园，375，331，北院的酸奶大家的馅饼照澜院的涮羊肉。香山赏叶，福海泛舟，西大挥汗，新水苦读。校门内外的美丽新世界，自由的空气，无限的可能，让人应接不暇。

我们被扔到了孤悬二楼的发七二，远离大部队。同学里一无痞子二无疯子三无天才，大部分时候正襟危坐，偶尔有点蔫坏和闷骚：有自强不息典范齐博士，亦有厚德载物楷模傅老头；有大哥风范如左老，亦有少不更事如石头；有好勇斗狠的南方小个凤姐，亦有多愁多病的黑脸大汉高士元；有不管不顾的东北马大哈小志，亦有毫厘不差的绍兴金账簿老梆；有淘气老蒙、捣蛋公公、神秘的P和憨厚的Q。一众人等没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偶尔有些混场电影顺本书踹个厕所门的小恶作剧；献血时大义凛然地颈颈受戮者有之，采用喝酒法运动法熬夜法直接扔化验单法绞尽脑汁惜血如金者亦有之。

我们这拨人的强项是跟书本较劲，会打个球下个棋的就算多才多艺，如果碰巧歌还唱得不错，那差不多就可以去竞选学生会主席了。当然书中也自有颜如玉。正是北岛和舒婷的朦胧诗有点过

气，西方思潮在校园里泛滥的时候，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自是囫囵吞枣不知所云，倒是老祖宗的故纸堆中偶尔能给荷尔蒙疯狂生长的壮丁们找着些乐子，譬如嫖毒譬如焦大。文体活动方面乏善可陈：系运会基本靠专业的翟卫萍一秒一秒破记录来支撑，多次惊动四朵金花助阵的最大规模群众运动——足球五年总共进了四个球，倒是肖冰和老蒙的象棋算是个小小的突破。双扣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也引发了几乎所有的班内肢体冲突（基本围绕凤姐发生），要不就是周末一教和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的动作片，周六看了周日一定得上自习。也是，难道清华还有人周末休两天么？

日子像一本书一页页翻过，又像是一条缓缓流淌的大河，平静、水波不兴。不经意间，这些木讷、爱较真、举轻若重的家伙们已经历了生老病死，人到中年。那些共同度过的日子层层叠叠地铺垫在心里最深处的角落，不会轻易触及，却让人觉得踏实而温暖。二十年后再回首，在这些曾经年轻的面孔上看到自己生命中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落，那些曾经的欢乐和悲伤；年少的轻狂，黑暗中的叹息；牵手，放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青春。跋山涉水来相聚，乘兴而至，兴尽而归，不亦乐乎。

大学其实是个很诡异的地方。那么些人，从那么远的地方忽然间聚到一起，呼吸相闻、抵足而眠好几年；又忽然间一哄而散，像几滴水被撒进无边的大海，从此人海两茫茫，就像那一段日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毕业前，各种悲欢离合集中上演。有人稚气未脱，有人已经苍老；得意者把酒言欢，失意人向隅而泣；多情者另结新欢，无情者棒打鸳鸯；有人奔向新大陆，有人回到老地方。人头攒动的北京站，我们在站台间来回穿梭，掐着时间送别开往东南西北的列车。开往上海的13次，全封闭空调车，可怜车窗内外的人儿只能贴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未几，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那是获奖的校园歌手许蔚：

我爱你 塞北的雪
飘飘洒洒漫天遍野
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
你的心地是那样的纯洁
你是春雨的亲姐妹哟
你是春天派出的使节

春天的使节

……

喧闹的站台上突然寂静下来。离愁，像北京的雪花一样漫天飘落下来，飘落到七月流火的站台上，飘落到我们年轻而炽热的脸庞。

那时我们还年轻如梦。

那时我们还年轻如梦。

后记：其实这篇文章更应该让齐老来写，这家伙自从二十五年前进了清华大门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又或者是老丹、程瑜军和周逢权，他们离开得最久，应该有最浓的思念吧；要不就是远隔重洋在美帝及其走狗奴役下水深火热的老二、小谢、马老头夫妇、小志、P、任亮、凤姐、大圣、刘俊宏和翟卫萍，乡愁和对和谐社会的渴望一定会让

思念更加热切；当然他们当中弃暗投明的老红、Q和周艳红就更有教育意义，毕竟浪子回头金不换；当仁不让的是多年来坚守在艰苦的电力行业第一线的左老、老梆、老蒙、老凯、王永刚和李头，昔日藏器于身，今日党国栋梁；不务正业的傅老头夫妇、刘阳、公公和高士元也行，在别的岗位上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也是好的啊；最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四朵金花，她们幸福所以我们也幸福；差点忘了来自更远的远方的哈润、阿西妮、拉利特和彼雷德拉，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清华记忆；还有先走一步的李庆利、牛哥和赵凯，他们一定会从天堂里给还在无边的苦海中挣扎的我们送来最好最深的祝福。阿门。👍

回忆在清华的实验课

石晓莉（高7）



清华五年，学过的各种有用没用的课程少说也有五、六十门，时至今日，绝大部分都还给了老师。甚至有些课，连任课老师长什么样都忘记了（清华的教授们听到不要骂我）。但是，有几次实验课在我的记忆中却始终不曾抹掉。

石晓莉，河南周口人，清华大学电机系工学学士（1992），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工学硕士（1995）。曾就职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门子（中国）公司，现就职于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交通部，任市场总监。

大二时有一门《普通物理实验》课，其中有一节是光学实验。印象中是在位于大礼堂西南侧阶梯教室南面的一栋实验楼里上的，今天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栋楼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当时做光学实验的那个实验室挂着厚厚的天鹅绒窗帘，诺大的房间显得阴森森的。实验课开始了，每个同学都对着面前的光学仪器使劲地往里看，试图透过仪器中央的那个十字叉看到希望中的光学图像。后排的一个男生（我记得是郭楚凡同学，如果记错了，请楚凡同学见谅，并检举揭发

到底是谁！）也装模作样地在他的位置上鼓捣。直到快下课的时候，听到他对带我们实验的老师抱怨：怎么一个图像也出不来？老师闻声走到他的座位前，俯身对着他的仪器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桌上的电源插座，说：“你连这台仪器的电源都没插，怎么可能有图像出来！”

我晕……真想知道楚凡同学这大半节课都看到了些什么！这也成了我多年来心中的一个疑问。后来遇到了我家先生，谈起大学里的趣事，才知道犯此低级错误的不仅是楚凡同学一人，我家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更倒霉的是，他犯此错误的时候刚好是实验课考试，为此在他的大学履历中还留下了唯一一次补考记录。当我问他没开电源的光学仪器里到底会不会有图像时，我家先生说：“向毛主席保证，当时真的看到有图像。不过经后来考证，当时看到的所谓图像是通过没遮挡严的窗帘透过来的太阳光。”可怜的郭楚凡，可能也是因为坐在窗户边上，对着太阳光研究了大半节课。

大三的时候开的有一门《数字电子技术》课。配合课程的进度，每周有一个晚上到主楼自动化系的实验室做实验。有一次，我跟同宿舍的历辉搭档，在面包板上搭电路。历辉同学心灵手巧，把细细的电线比量好长短，再用剥线钳把电线两端剥去塑料皮，露出金属芯，然后再用尖嘴钳把金属芯折成直角，插到相应的面包板孔里。电路搭得横平竖直，非常漂亮。可是到调试的时候，该有的波形就是死活不出来。我们把班里公认的学习成绩最好、动手能力最强的马仙云同学搭的电路拿过来一一比照。没错呀，一摸一样，怎么人家都顺利地调通了，我们的就调不出来呢？没办法只好求助于带实验的老师（说是老师，其实也就是比我们高几级的自动

化系的研究生，很腼腆，不过人长得倒是满帅的）。老师对着视波器，帮我们从电源开始，顺着电路一点一点地往下捋。前面的电路都没问题，捋到一个芯片挨得很近的两条腿时，奇怪的事发生了：本来这两条腿之间是由一根导线相连的，可是这两条腿在视波器上出来的图形竟相差甚远。把那根导线取出来用万用表一量，不通！把短短的绝缘皮剥开一看，那根导线中间竟然是断的！当时分析极有可能是历辉同学太追求工艺完美，折直角的时候太用力，把那根导线拽断了。

说到《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还有一个小插曲。教《数电》的是自动化系一个极其nice的教授，每次上课都戴着一顶压舌帽。有一天上课，天气已经进入春夏之交，戴帽子已然不合时宜了。教授讲着讲着课，可能感觉有点热，下意识地把帽子摘了下来。坐在四教大教室上课的全系150多位同学看到老师摘帽子，先是楞了一秒钟，然后是哄堂大笑。原来压舌帽下面露出来的是教授那憎亮的秃头。教授看到我们笑，举起手挠了挠头，也跟着嘿嘿笑了两声。从此，教授来上课再也没戴过帽子，倒是凉快了。

大四暑假的那个小学期，我们上了一门《激光技术》课，也是每周有一个晚上在得主楼做实验。我还记得带我们实验的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女教授。这回是按学号分组，我跟杨勇明、黄从力分到了一组。男同学的动手能力是比女生强多了，这点不服不行。跟两位男生分在一组，感觉轻松多了。我们仨分工协作，他们俩负责动手调试，我负责记录数据、整理报告，每次我们组都是最快完成的。做完实验，我们仨就会跑到“大学生之家”去买冰淇淋，轮流请客。出来的时候每人手里拎着一袋冰淇淋，在夏夜的微风中满校园乱转。那时

候卖的冰淇淋就是一个白塑料袋装着，用五颜六色的尼龙绳扎着口的那种，用勺子挖着吃，一大袋冰淇淋能吃很长时间。恐怕现在很难找到那么实惠的冰淇淋了。

我们班的专业是高电压工程，可是直到大四上《高电压试验技术》课之前，恐怕没有哪个同学对高电压到底是什么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高电压试验技术》是我们班主任金显赫老师带我们上实验课。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到位于校园东北角的“高压实验室”做高电压实验的情形。在上千还是上万伏的高压回路里要串进一个56欧的小电阻，这个56欧的小电阻当然不能用普通电子电路中的那种只有小手指甲盖大小的瓷电阻了。你们猜，在高电压回路里这个56欧的小电阻是用什么做的？告诉你们吧，是用蒸馏水！在一根一米多长的透明的玻璃管里灌满蒸馏水，两头用金属螺栓封堵好，一个用于高电压实验用小电阻就做好啦。为了制作这个小电阻，我们组的马晖同学自告奋勇骑三轮车带着一个大塑料壶去拉蒸馏水，我们几个人在实验室等他。约摸着他应该回来的时候，我们到实验室外面的小路上去迎他。远远地看到马晖歪歪扭扭地骑着三轮车由南往北而来，快到“高压实验室”门口的时候，那是一段下坡，我们眼瞅着马晖在众人的惊呼声中把三轮车骑到了路边的沟里，再翻倒……还好，人没受伤，更重要的是那桶蒸馏水还没漏。大家七手八脚把三轮车扶起来，再把蒸馏水抬进实验室。在五六双近乎虔诚的眼神注视下，蒸馏水被缓缓注入到玻璃管中，快到56欧刻度的时候，还拿万用表量着，直到万用表的读数exactly指到56欧为止。当我们用亲手制作的“水电阻”顺利完成实验项目的时候，似乎对这个专业有了那么一丝自豪。👍